

需要怎样的坝型就采用什么样的坝型的教导，帮助他创造性地完成了一次坝型方案的确定。刘应尘同学说她遗憾的是一辈子没能在黄河、长江上干过，但是母校清华给了她坚实的基础教育和永不服输的精神，使她在几十年计算机软件工作中做出了可喜成绩，她自主开发的工厂设计三维软件，与国外的产品比较，毫不逊色，令她自豪。

座谈会虽然进行了3次，会下还有不少交谈的机会，但是要说的话太多、太多。我们共同的心声是：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，我们实现了蒋南翔校长要求的“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，我

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，我们为国家的发展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我们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。

聚会时，全体到会同学再次共同高唱《水利建设者之歌》，庞玉馥、夏作云、万挺（万陵馨）、王向东（王孝先）、杨仲雄、白庆云等同学表演了诗歌联唱《我心中永远的清华园》，重新唱出百花山植树、密云水库实习等当年的歌曲。薛照熙同学唱起了自己作词作曲的《我的学友，我的兄弟姐妹》等歌曲。石恒芳同学为大家带来了他的《石恒芳诗词集》，还演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《学子之歌》。我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校庆日。

坚定信仰 一路前行

○陈裕宗（1960机械）



陈裕宗
学长

追寻已逝六十载，清华园里再相聚。六十年的风雨历程，六十年的不懈拼搏，每个学友都有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，每个脸庞都留下了岁月的沧桑，每道皱纹都记

录了人生的历练，每根白发都经历了风雨的洗礼。

下面是我这六十年来回忆片段，与同窗学友们共同分享。

偶然撞进清华园

1955年参加高考前填报志愿时，我被通知保送到了大连海运学院。但世事无常，临高考前三天，大连海运学院取消了在厦门的保送名额，而我也要马上重新填报第一志愿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措手不及，我的父母亲都没读过书，家庭经济又困难，考虑到种种的现实因素，我想填报离家较近的上海交通大学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发小吕世磐劝我跟他填报同

□ 我与清华

一所大学——清华大学。结果是，我们都被清华录取了。当年厦门市共有三人被清华大学录取，除了我和吕世磐，另一人是保送名额上的。想来我和吕世磐的缘分是深厚的，我们小学同桌，中学同班，大学同校（他在水利系）。

意料之外的喜悦，我就这样偶然地撞进了清华园。这也成全了我与吕世磐一生的深厚友谊。我记得当时要到清华报到，却苦于没有路费，他把每月在银行贴一元储票，一年积攒下来的十二块钱交到我手上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

在清华园的六年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美好的六年，它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石。扎实的基础课学习，导师的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中造就培养了我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感谢清华园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它是我漫长的寒暑假中最理想的安身之处。在清华园的六年，我只回过一次家，还是儿时好友胡震雷拿出大半个月的工资寄给我买了往返车票，才得以成行。从清华毕业时，我获得了优良毕业生奖状。

清华园里留遗憾

1961年9月初，毕业分配结束。聚散有时，无论多么不舍，相处六载的同窗学友也要各奔天涯了。我肩扛一个装着书籍、衣物的破旧木箱，一手拎着一个装着被褥的大麻袋，兴冲冲地走向二校门，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真诚地感谢学校六年来的培养。当我回过头时，心里突然有种很大的落差，好像失去了什么。

进入清华园，我就开始争取入党，六年来，思想汇报不断，也常常找党员谈心，但入党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。到了离开清

华园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找我谈过话，哪怕是一句鼓励的话。我觉得很无奈，心有不甘，我边走边回头，一直走出东大门上了公交车，还在不停思考着。我想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还想到周围亦有不少比我优秀的同学也未被接纳入党。于是我逐渐收拾好心情，准备投入到社会的大熔炉里，好好历练。

家庭重担扛上肩

我和妻子是中学同学，大学期间，她读南京四年制本科，比我早两年毕业。她说等我一毕业就结婚。我说别，家里经济困难，还要供养三个妹妹。我毕业时，大妹15岁，二妹10岁，小妹5岁。她说不要紧，我们一起承担。我终是拗不过她。就在我扛着行李离开清华到北京火车站时，她已从出差地赶到车站跟我一起上火车南下，途径上海、杭州，我们各逗留了两天，最后回到了厦门。我们以旅行的方式结婚。想来，这就是现代人说的“裸婚”了吧。

毕业分配时，由于我对故土无比的眷恋，尤其是背负着家庭的重担，一心想回家乡工作，但福建没有名额，鉴于组织上的照顾，我被分配到离家最近的上海，至少家庭也好有个照应。其次，我觉得今后从大城市往小地方调动也会容易一些。没想到，我在上海一干就是13个春秋，才找到一个机会调回厦门。

当年我每月工资是48元5角，要寄30元回家，转正后工资提升到59元5角，但儿子也降临了。记得刚参加工作时，班上某同学出差到上海，遇到困难，托人向我筹借点钱，当时我实在是爱莫能助，刚到新单位，尚未建立亲近的朋友关系，实

在羞于开口而未能帮上忙，至今我还感到很内疚，这件事让我记了半个多世纪。

在上海的13年，是我经济生活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是我知识积累更新、工作开拓卓有成效的美好时光。妹妹们渐渐成长，开始陆续走出家门，其实我的“脱贫”是在儿子参加工作之后。13年来，我仍然过着简朴的学徒工似的生活，但却夜以继日地疯狂吸收新知识。在清华已学习掌握了俄语和英语，在上海研究所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又掌握了日语和德语。所谓掌握，就是能够阅读与翻译，即“哑巴”外语，但足够我做科研所需了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已具备了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的能力，并选择其中最富有参考价值的国外文献，翻译并出版了近20万字的译文集。接着科研课题也通过部局鉴定。

在研究所，我从技术员起步，到课题项目负责人，到1965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。1966年初，党支部也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。但不久之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，我的入党问题尚未经所党委会批准就搁浅了。但我无怨无悔，人生不就是不断接受考验的过程吗？我经历了全所批判走资派大会的洗礼，曾挂上保皇派的胸牌立于台旁接受陪斗。

1967年，我先是被下放到本研究室试制工厂劳动，后于1969年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农场劳动，再于1972年下放到上海电子器材厂车间顶岗劳动。劳动让我流淌汗水，净化心灵。

在高校如鱼得水

1973年，我终于回到了家乡，调入高校工作。由于在科研岗位实打实干过，

在工厂企业历练过，我一到高校很快就融入当地科协下属科技交流站，深入到有关工厂与工人、技术员一起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我定期为工人、技术员上课，80年代我还应邀到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兼课，“隔空”做了同窗梁光启的“助教”。

到高校后，开始教专业技术基础课——“金属材料及热处理”和“金属工艺学”。后来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通过自学和进修又开设了“科学管理学”。任教20多年直到退休，我每一次上课，都是脱稿开讲，并适时地开展课堂互动。所以不管是学生，还是来进修的教师，都觉得听我讲课很享受。其实，他们不知道我每组织一堂教学活动，要花费多少精力，连上课前一天晚上的觉都睡不踏实。

在高校，我前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、系主任、教务处处长并兼高教研究室主任。1992年因教学管理成绩显著，荣获集美陈嘉庚奖教金；同年荣获国务院表彰，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厚德载物 上善若水

我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入党，历经27载。期间有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动员我加入，都被我婉拒了。我始终认定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道路。

我的经历是一笔财富。“厚德载物”是我的母校清华的校训，我亦把它作为家训，告知子孙只有道德高尚者才能承担重任，有德才有福，并且福祉大众。

现在我可谓是此生无憾。有人说，人的一生只有三天，即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我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昨天的业绩，享受今天的幸福，走向快乐美好的明天。